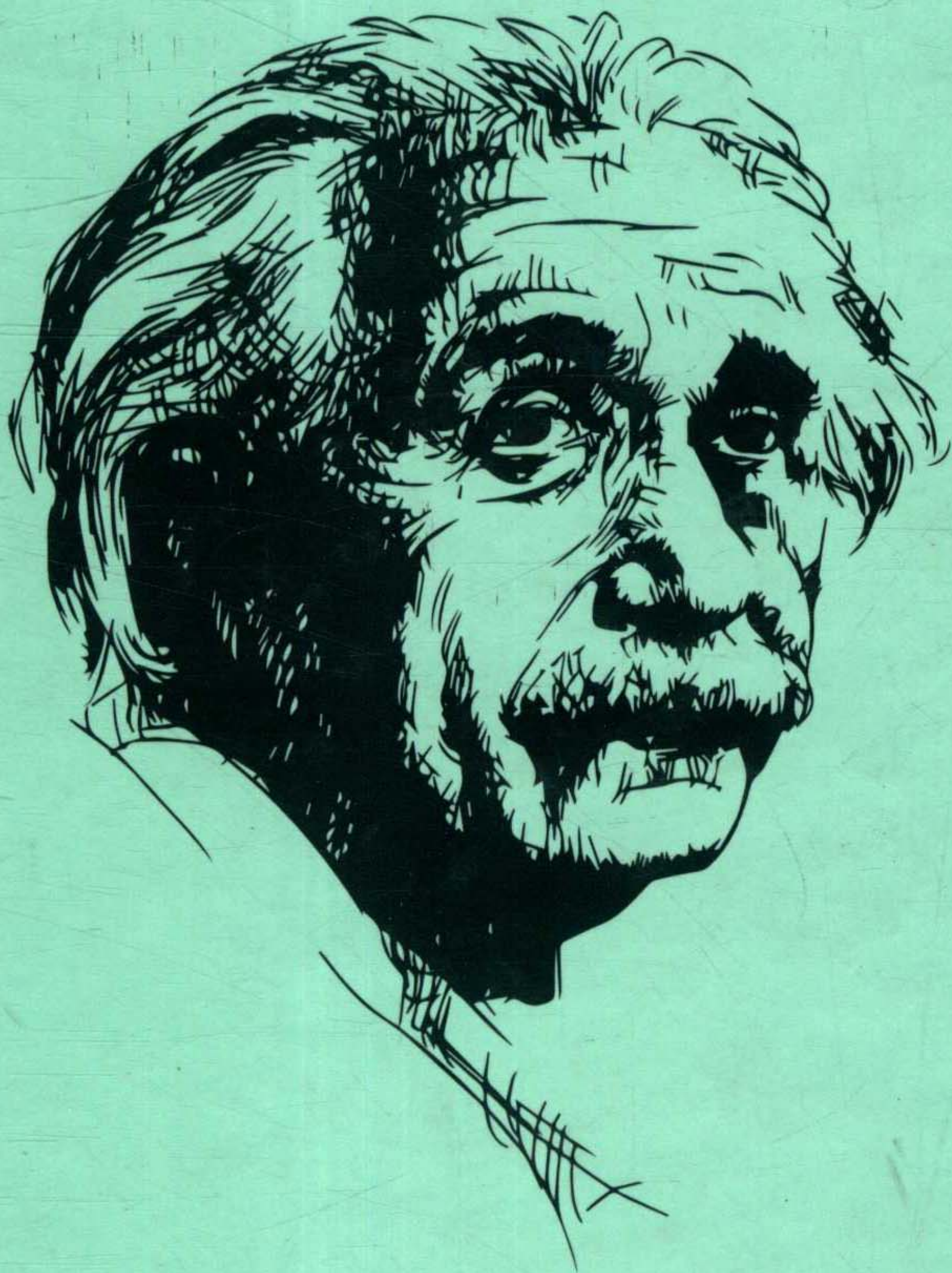




爱因斯坦论和平

〔美〕O. 内森 H. 诺登 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爱因斯坦论和平

[美] O. 内森 H. 诺登 编

李醒民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因斯坦论和平/(美)O. 内森,(美)H. 诺登编;李醒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3261-9

I. ①爱… II. ①O… ②H… ③李… III. ①爱因斯坦(Einstein, Albert 1879—1955)—和平学—思想评论 IV. ①K837.126.11 ②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968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爱因斯坦论和平

〔美〕 O. 内森 H. 诺登 编
李醒民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261-9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0½
定价:92.00 元

编者按语

在编辑爱因斯坦为消除战争而写的文章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问题。当这项工作在他去世后不久就着手进行时，我们曾希望大部分有关材料已保存在他的档案里。但是我们不久就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爱因斯坦本人不太关心系统地收集他的文章和书信；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他才对保存阅读过的许多重要文献和书信予以充分的注意。此外，爱因斯坦许多手写信件并没有留下副本用来归档；并且，他移居美国前几年中积累起来的一些材料，在1933年纳粹洗劫他家时或是丢失，或是被偷走了。

为了记载爱因斯坦在和平事业上所做出的毕生努力，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从世界各地收集所需要的材料，但无法断定某些重要文献是否有所遗漏；有些材料，特别是爱因斯坦早期岁月中的手写信件，可能要花很长时期才会重见天日。同样，尽管我们能在许多美国和外国报纸杂志上找到并使用爱因斯坦写的（或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章和声明，但也还可能有我们未注意到的已发表材料。爱因斯坦不但为著名杂志，而且也为不起眼的小书刊写东西，其中有些早已停刊；因此，寻找材料的工作常常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尽管有可能遗漏，但是我们确信，爱因斯坦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在本书已有充分的记载，今后

若发现什么材料,根据本书收集到的材料对爱因斯坦观点所做出的解释不会有加以改变的必要。

本书中的许多文献以前已经公开发表,但是刊登这些文献的出版物却非常零散,实际上常常难以找到。不过,本书中的爱因斯坦的大多数信件尚属首次公开。没有注明出处的材料,都可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遗产”中找到,该机构是爱因斯坦的文献材料的保管者。除了极少数例外,爱因斯坦总是以他感到亲切而又运用自如的德语起草科学著作、书信和公开声明。他的文风,并不总是平铺直叙,却常常给人以简洁的,有时是雄辩的印象。由于必须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这样就不仅产生了翻译本身所固有的问题,而且我们还遇到这样的困难:许多材料先前以英文译文发表,但在我们看来,它们并不忠实于爱因斯坦的德文原文。这样又产生了下面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予以重译。由于某些译文已一再重印,而且由于同一份材料存在不同译文会带来混乱,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颇费踌躇。

我们对采用新译法并用来对付人们可能提出的异议的理由,做了仔细权衡;我们认识到,应该在本书的前面部分和后几章之间做出区分。由于爱因斯坦在欧洲时期的材料的翻译一般是在他不知晓或他没表示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我们感到有理由对我们看来没有准确表达原文的那些材料重新翻译。关于爱因斯坦在美国期间所积累起来的许多文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他现在生活在说英语的国度里,爱因斯坦对他的文字的英译就更为关注了,因为他的声明和文字通常是用英文提供给公众或他的通信者的,而德文原文却是不为人所知的。

即使是在爱因斯坦的美国岁月里,也有一些他的讲话是以未经他审阅的英译印出或提供给读者的。但是,在涉及他认为特别重要或会影响舆论的材料时,他是非常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对他所写的每个句子的英译都煞费苦心,就个别段落甚至某个字眼与译者费心斟酌。要不是他的文稿数量太大,他本会对他所有文稿的译文都一一给予同样细心的关注。爱因斯坦对于如何才能确切表达他的种种思想和信念是颇费心思的。除了日常通信外,他仔细起草每一封信、每一份手稿,并常常谈到写作的艰辛。对他来说,写作也并非总是很容易的。

爱因斯坦在美国时期的文稿,出自不同朋友之手的译文,其价值是不同的。他们的翻译常常显得笨拙,或不能准确地表达爱因斯坦的原意。因此,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甚至经爱因斯坦本人表示默许或允许发表的英译,是否也应进行修订。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难于做出决定,因为我们意识到,人们会怀疑我们是否有资格对爱因斯坦本人事实上已经许可的任何英译做哪怕是最小的改动。但经过仔细考虑,为了使英译更忠实于原文,我们决定在我们认为必要的地方修订这些译文。与爱因斯坦亲密的个人交往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倘若爱因斯坦在世,他会希望我们正确表达他在战争与和平方面的见解和所从事的活动的。

除了极少数无法获得原文的情况,我们在对爱因斯坦手稿的现有译文做修订时,所依据的都是他的手稿。我们始终以使爱因斯坦材料的英译成为最终定稿为目标,使得它们不仅能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的意义和精神,而且还能达到语言上的某种统一,以使英语世界的人们与爱因斯坦之间能够进行交流。遗憾的是,在许

多情况下,对于以前已经发表的一种或几种英译,仍有必要予以重译。每当译文有所修订时,均在各章“注释”中予以注明;但是,若要指出哪些地方做了修订,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本书收集并精心修订的英译到时会被看作是关于爱因斯坦文字的最可靠的英译。

应当提一下编者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尽管本书的意图是让爱因斯坦自己陈述自己的见解,但是要编者不加任何评论则是不可能的。必须有文字把各篇文章或书上下衔接起来,说明它们的背景以及它们写作时的前因后果,并勾勒特定历史时期总的轮廓。我们尽力把编者的评论限制在对材料的理解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范围内。一些与和平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资料 and 材料,仅当它们对于更充分了解爱因斯坦在世界和平问题上的活动和见解是不可或缺的情况下,才予以收入;但是,我们抵挡住了复制许多重要材料的诱惑,这些文献尽管与爱因斯坦的总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有关,但与本书的宗旨似乎并无多大关系。我们也没有收进爱因斯坦多年来收到的许多有趣信件。为了使读者看懂爱因斯坦对这些来信的复信,我们概述了这些信的内容,只在极少数特殊场合才予以重印。

我们有幸得到各方面的有益帮助。我们对国内外的许多个人、组织、报刊为我们提供材料和重要信息表示感谢。夏洛特·波梅兰茨(Charlotte Pomerantz)小姐做大量工作,在手稿最后修订的过程中,她对材料做出了很有见地的分析,发挥了十分高超的编辑技巧。海伦妮·杜卡斯(Helene Dukas)小姐是爱因斯坦近三十年的秘书,自爱因斯坦逝世以来,她一直是他的遗稿的受托管理人

和档案保管人之一。她从他的档案中为我们收集了所有与本书有关的材料；她的丰富经验以及长期、忠心的服务给予我们很大帮助。她的合作对于我们完成本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奥托·内森(Otto Nathan)

海因茨·诺登(Heinz Norden)

1960年8月于纽约

注释说明^①

爱因斯坦的私人档案是通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遗产”得到的，它们是在本书中重新发表的文献的主要来源。另外的材料来自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原始资料，这些我们在注释中都做了说明。下面的缩写式涉及某些比较重要的原始材料书籍。

MW *Mein Weltbild* (《我的世界观》), Albert Einstein 著, Carl Seelig 编, 苏黎世 Europeterag 出版社 1953 年版。这是爱因斯坦短文的主要德语选集。它是用同一标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由 Querido-Verlag 出版社 1934 年出版的书的扩充版。(1934 年的版本被称之为 MWI)。

TWAISI *The World As I See It* (《我所看到的世界》), Albert Einstein 著, Alan Harris 译, 新节略版, 纽约哲学文库 1949 年出版。以 MW 为基础。

IAO *Ideas and Opinions* (《思想和见解》), Albert Einstein 著, Sonja Bargmann 修订, 纽约 Crown Publishers, Inc. 1954 年版。主要以 MW 为基础。

① 此处的“注释说明”以及前面的“编者按语”本来排印在英文原版书的正文之后，现移译于此。为了便于读者翻检，我们将各章原来在书后集中排印的注释作为脚注排出，原“注释”之前的说明在此译出。——译者

OOMLY *Out of My Later Years* (《晚年集》), Albert Einstein 著, 纽约哲学文库 1950 年版。

TFAW *The Fight Against War* (《反战斗争》), Albert Einstein 著, Alfred Lief 编, John Day 小册子丛刊第 20 号, 纽约 The Johe Day Co. 1933 年版。

SCHILPP *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哲学家-科学家》), Paul Arthur Schilpp 编, 《在世的哲学家文库》, 纽约 Tudor Publishing Co. 1951 年第 2 版。

FRANK *Einstein—Sein Leben und Seinz Zeit* (《爱因斯坦——他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 Philipp Frank 著, 慕尼黑 Paul List Verlag 1949 版。

SEELIG *Albert Einstein: Eine dokumentarische Biographie*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文献根据的传记》), Carl Seelig 著, 苏黎世 Europa Verlag 1954 年版。

目 录

引言	奥托·内森 1
序言	伯特兰·罗素 11
第 1 章 战争的现实(1914~1918)	14
第 2 章 德国革命:希望和幻灭(1919~1923).....	53
第 3 章 国际合作和国际联盟(1922~1927)	98
第 4 章 反对战争(Ⅰ)(1928~1931).....	141
第 5 章 反对战争(Ⅱ)(1931~1932).....	196
第 6 章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前夜(1932~1933).....	251
第 7 章 纳粹主义的出现和倡导备战——离开 欧洲(1933).....	318
第 8 章 到达美国重新武装和集体安全(1933~1939).....	360
第 9 章 原子时代的开始(1939~1940).....	418
第 10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451
第 11 章 原子武器的威胁(1945)	487
第 12 章 战斗精神(1946)	532
第 13 章 对超国家组织的需要(1947)	574
第 14 章 为人类继续生存而斗争(1948)	649

第 15 章	全面裁军抑或一无所有(1949~1950)	718
第 16 章	为思想自由而战(1951~1952)	762
第 17 章	生命的黄昏(1953~1954)	809
第 18 章	全球毁灭的威胁(1955)	863

索引.....	902
---------	-----

附录 简论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	939
---------------------	-----

译者后记.....	955
-----------	-----

引 言

我最后一次与爱因斯坦谈话，仅在他逝世之前几小时。他谈到自战争结束和德国重新武装以来，在美国对公民自由层层设防，他认为这是最不明智的，是为世界确立真正的和平秩序设置了严重的障碍。几天前，他一生最后一次在九位科学家的声明上签了名，这篇声明告诫世人，除非在不远的将来取消战争体制，否则就要冒毁灭世界的危险。

这篇声明发布到全世界几个月之后，我来到伦敦。我与伯特兰·罗素讨论了爱因斯坦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所起的独特作用，这一斗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更为紧迫。正是在那时，我构想出一个计划，它在本书中实现了。由于爱因斯坦再也不能够向世人讲话了，再也不能够亲自为全球和平奋斗了，我觉得把他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所做的永不休止的努力的记载加以出版，也许有助于为争取一个较健全的世界的斗争。

在爱因斯坦逝世后出版爱因斯坦著作的第一部选集，应该是专门记录他在和平事业中活动的集子，这样做也许是适当的。爱因斯坦对宇宙知识的渴求，使得他一生中的其他一切事情都黯然失色。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指南针使他心荡神驰，这首次激起他对自然规律的好奇心。他的思想盛满了对科学的兴趣，直至

他逝世,其他一切东西都没有他的科学工作那么重要。但是,我从多年享有他的友谊和信任所获得的经验知道,除了献身科学之外,就其内心而言,再也没有什么事业比他决心永远消除战争体制更重要、更关切了。这种决心的根源何在?激励他的力量又是什么?

爱因斯坦为消除战争而斗争,不仅仅因为他憎恨暴行,而且因为他认为企图通过人类屠杀解决国际争端是骇人听闻的。他深信,只要战争作为一种被接受的惯例而存在,那么个人的思想自由——他把这种自由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就不会实现。军事机构的存在,把年青人训练成为最臭名昭著的自私目的服务的不思考的工具,战争将在平民生活中引起道德沦丧——爱因斯坦认为这一切都是与自由人的尊严水火不容的。

爱因斯坦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之所以相信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作为一位令人信服的平等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和人对人的剥削,他觉得资本主义制度比先前的任何经济组织更能巧妙地为这一切大开方便之门。他之所以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确信,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充分地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当代社会许多罪恶的渊藪。最后,他之所以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深信不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人们已知的任何其他制度下,更有可能达到与公共福利相一致的、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

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乃是他深深地感受到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公正所做出的反应,它既不是有条理研究的结果,也不是局限在意识形态信条的范围内。他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心智以及对管制的厌恶,不会容忍对他的思想、行为或表达方式施加任何强

制。由于他的心智在系统的推理中受到训练,他相信中央计划经济的必然性,中央计划经济能使生产和分配井井有条,能够为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利益使用人的劳动能力。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彻底的计划经济可能引起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也许是“伴随着个人的完全奴役”。爱因斯坦总是对权力集中忧心忡忡,不管产生权力集中的经济体制是什么。他坚持发展真正的政治民主,这不仅仅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他的同胞怀有平等和兄弟般的情感;他认为真正的民主对于滥用经济力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解毒剂,在他看来这种滥用对社会福利构成持续不断的威胁。正是对被集中起来的权力的担心,以及对权力集中可能导致的野心和强制的忧虑,使得爱因斯坦不可能期望社会主义会成为反对战争的保证。他不具有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念: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不会进行战争;他担心在它们之间驱使的力量,也许会变得像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驱使的力量那么强大有力,那么富有灾难性。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销毁武器和废除战争体制也是和平的须臾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vii

我常常感到,这种理性的分析并没有充分地说明爱因斯坦对于人们生活在太平世界的焦虑。要揭示一个人促使他像他期望的那样去做或不去做的行为的内在动机,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个人的内在动机对他本人来说往往也是未知的。尽管意识到这些困难,我应该仍然乐于记下在我试图理解爱因斯坦这位非凡的人才时所产生的某些看法。他自己曾经说过,他的和平主义并不是受到任何理智的理论的促动,而是建立在对种种残忍和敌意深恶痛绝的基础上。这种深恶痛绝使他在四十多年间成为一

位反对战争的斗士,他把许多时间和精力投身于斗争,另外又谨慎地照管他的科学工作,然而这种深恶痛绝是如何萌生的呢?这种深恶痛绝之所以存在或愈演愈烈,是由于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的努力,这种说法可以成立吗?就能够成立而论,他在1914年战争爆发后首次公开表达了和平主义的信念。当时,爱因斯坦已在全世界科学家中获得了显赫的声望;他在科学史中的地位已确立起来。他是一个深沉的宗教徒——正如他曾经自称的那样是一位异教徒。他以深深的谦卑之情敬畏大自然,他一再面对他的研究之树^①肃然起敬,沉思它们枝叶的繁茂和美丽,沉思人们在数千年探究和观察中获得自然规律的细微的理解力。1914年夏天,当他把战争厌恶地视为“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时,当他为自己属于“堕落的”人种而痛心疾首时,我相信他必定感到,人们在战争中的行为亵渎了庄严的宇宙规律,千百万人的任性屠杀与自然进程格格不入,而他作为科学家却对宇宙规律和自然进程怀有最深厚的敬畏之情。这恐怕是他对残暴行为深恶痛绝的真正根源,也是他热情而虔诚地努力促进消除每一个战争体制的动力的真正根源。也许正因为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从事的是试图增加人对自然理解的最抽象的工作,所以他才觉得迫切需要使人深信不可藐视大自然的意志,并决定献身于为人类的幸存而斗争的最具体的、即使有时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以及创造性地实现这一目标。

一些人非难爱因斯坦在政治事务中是幼稚的,指责他把自己的名声给予非正统的事业是过于慷慨了,这些人大概没有认识到,

^① the tree, 似为双关语。其本意为“树”,隐喻“(钉死耶稣的)十字架”。——译者

爱因斯坦从来也没有支持过那些有可能违背指导他的原则的事业。尽管他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在他的一生中没有改变,但是在他的信念方面或者在这些信念应用于他所处时代出现的实际问题方面,他远不是固执己见的或教条主义的。在德国纳粹主义的早期,他宣告他再也不能够倡导反战政策了,而在此前一些岁月里,他曾如此热情地宣传过这一政策。当时他处在和平主义运动的极其猛烈的攻击之下;可是,他本人从未感到他抛弃了和平主义事业,他继续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令人信服的、一心一意的和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不能在面临变化着的环境时固守僵硬的政策。在爱因斯坦看来,和平主义意味着建立世界机构,这些机构在不诉诸强权和暴力的情况下就能够消除战争,维护国际和平。但是,和平主义并不意味着在纳粹德国这样的国家面前,其他国家应该依然不设防,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公开地为战争和侵略做准备。事实上,当爱因斯坦要求西方国家重新武装起来以反抗纳粹主义的威胁时,他认为他正在服务于他所理解的和平主义事业;他觉得,如果德国知道西方国家在冲突事件中做了军事上的准备,那么就存在避免战争的较好机会。

在 1939 年夏所谓的那封预言性的信函中,当爱因斯坦劝告罗斯福总统,原子弹的生产已变得明显可能时,当他建议美国政府关注支持和加速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与产生原子能有关的实验工作时,他就是按照类似的前提行动的。爱因斯坦之所以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一建议,并不是因为他想要美国利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扩大死亡;相反地,他希望美国拥有原子弹可以使德国人更不情愿爆炸原子弹,爱因斯坦担心德国人很快就会成功地生产原子弹。在